

安徽靠啥实现国内汽车产量第一



奇瑞汽车累计出口突破500万辆，江汽集团百万元级新能源汽车品牌尊界S800上市4个月大定破1.5万辆，蔚来开启乐道、萤火虫多品牌战略协同模式……今年前10个月，安徽汽车产量达275.55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43.03万辆，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位，距年度产量首次全国登顶越来越近。目前，安徽集聚了奇瑞集团、蔚来汽车、大众安徽、合肥比亚迪、江汽集团、合肥长安、汉马科技7家整车企业，以及覆盖“三电”“三智”等全链条的规上零部件企业3000余家。安徽成为汽车制造第一大省固然与统计口径的调整有关，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安徽抢抓新能源汽车产业风口，坚定布局、持续深耕。

招大引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确立了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国家战略，并接续制定面向2020年和2035年的产业发展规划。在中部地区崛起大潮中，安徽积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将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重点布局的新兴产业之一，出台了包括《支持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提质扩量增效若干政策》《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条例》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凭借政策东风，安徽构建合肥、芜湖“双核”联动，其他地市多点支撑的汽车产业发展格局，推动形成了整零协同配套、后市场加快发展的完整汽车产业体系。其中，合肥作为安徽科技高地带头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通过政府引导基金、风险投资等方式，吸引大量社会资本投入汽车产业。

2019年，蔚来汽车一度经营困难，资金链紧张，急需融资支持。2020年4月份，合肥市国资委会同多方资本，向蔚来汽车投资70亿元，成功扭转了公司的不利处境。此后，蔚来汽车迅速成长为新能源汽车赛道的重点企业，公司中国总部也落户合肥，为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增添了重要力量。

2021年7月9日，比亚迪合肥长丰基地项目正式签约，规划产能超百万辆，2022年6月底整车下线。该基地从谈判到签约仅用23天，从签约到开工用时42天，从计划合作到正式投产总共不到1年时间；2022年底，大众安徽首辆预量产车型在位于合肥经济开发区的整车制造基地如期下线；2025年6月，江淮汽车与华为合作打造的尊界800实现批量下线……随着这些企业投产、扩产，合肥市新能源汽车产量迎来指数级增

长。2021年合肥市新能源汽车产量为14.5万辆，2022年达25.5万辆，2023年达74.6万辆，2024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跃升至137.61万辆。

创新驱动

安徽众多的科研院所是支持汽车产业发展的技术“富矿”。“当前，安徽汽车产业创新动能加速释放，成果转化成效显著，有效增强了汽车产业的竞争力。”安徽省汽车办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今年夏天，在工大智聘（合肥）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实验室内，合肥工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成蹊又忙了一个暑假，他参与的国家发明专利“汽车电控半主动悬架系统控制方法”目前已在专用车型上进行试装调试，规模化量产在即。

空气悬架系统的攻关成果是产学研协作、以创新驱动安徽汽车产业发展的缩影。在蔚来先进制造新桥第二工厂，依托工业人工智能算法，80%制造场景由人工智能决策。“在智能化引领下，整套工厂系统高效运转，从收到用户订单到整车下线只要14天。”新桥第二工厂负责人殷亮表示。

记者了解到，蔚来汽车分别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合作，相继成立“中国科大·蔚来智能电动汽车联合实验室”“合工大·蔚来创新研究院”，目前已产出整车全域操作系统、5纳米车规级智能驾驶芯片等核心技术成果。

近日，奇瑞集团在安徽芜湖举办的2025奇瑞全球创新大会上，系统展示了其在电动化、智能化等前沿领域的一系列最新成果。“今天，我们的技术‘货架’上，已摆上了新一代AI智能车架、犀牛电池、轴向磁通矢量双电机、Carminid智能体，即将量产的L4级自动驾驶等一系列成果。”奇瑞集团董事长尹同跃介绍，奇瑞外部的“开阳实验室”集群，与全球100多所顶尖高校合作，开展1779项技术工程，有17个大方向、79个子项目，已经发掘了前沿课题4000多项。特别是开阳实验室以“小步立项、滚动牵手、多头输出、沿途下蛋”的灵活机制，打通了科技转化的“最后一米”。

在大众安徽合肥研发中心，大众安徽正创造新的行业标准。通过与本土供应商的深度协同，企业将车型研发周期从50个月压缩至34个月，成本降低40%。这种效率不仅体

现在研发端，更体现在生产端——大众安徽的工厂可实现1000辆级别的快速换色生产，灵活响应市场需求。

延链补链

伴随越来越多的整车企业投资建厂扩大产能，众多电池、电机、电控等汽车关键零部件企业也纷至沓来。目前，安徽已引育规上零部件企业3000余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逐步形成。

据了解，近年来安徽围绕整车企业开展“链主”招商，鼓励整车企业引导其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就近落地，推动集聚发展，推动整车产能向合肥、芜湖集聚，推动安庆、宣城、滁州、马鞍山等地市打造汽车零部件特色产业集群，实现汽车产业合理布局 and 高效生产。

2019年公司营收为0.8亿元，2024年营收升至40.65亿元——落户宣城以来，宣城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的发展令人称赞。“如今，总投资51.5亿元的四期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将新建年产1000万套新能源汽车网联及智能驾驶汽车产品生产线，达产后将新增营收约20亿元。”宣城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夏克强说。

作为安徽省重要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之一，宣城市汽车零部件产业已初步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体系。目前，全市共有汽车零部件企业700余家，2024年产值超850亿元，增长20%；其中规上工业企业470家，数量居全省前列。从产业链上游模具、有色金属、正负极材料等原材料加工，到中游传动轴、轮毂、密封件、精加工、内饰配件等环节加工，再到下游质量检测、车辆测试、充换电基

础设施生产建设，宣城汽车零部件产业聚集了中鼎集团、永茂泰、华域皮尔博格、保隆汽配、立讯精密等一批汽车零部件知名企业，部分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全球前列。

一辆传统汽车需要半导体芯片500颗，新能源汽车需要1500颗，而高端新能源汽车则需要3000颗。据测算，到2027年，合肥市新能源汽车要使用芯片约48.3亿颗，价值约408亿元。

面对车用芯片这一短板，安徽省围绕“车、路、云、网、图”关键要素，率先打造以晶圆厂为核心的区域IDM（垂直整合制造）模式，发挥本地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等设计端、制造端和需求端企业优势，围绕晶合集成等骨干企业，以显示驱动、电源管理、图像传感器等基础性车芯为突破口，形成设计、流片、制造、封装、测试、应用、迭代的本地生产链条，打造全国领先的车用芯片区域IDM模式。此外，安徽汽车厂商还联合高校一起攻克了车载芯片技术难关。如今，车载芯片不仅实现了国产化，还实现了量产。

在发展汽车产业集群的同时，安徽还搭建了“安徽省汽车产业供需对接平台”，促进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在技术研发、标准体系、质量管控等方面深入对接，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路演大厅”，常态化开展成果发布、专题研讨、技术交流、供需对接等多种活动，推动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高效精准对接。

“当前，安徽以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化发展为主线，通过精准‘双招双引’，完善配套体系，在原有主机厂结构基础上不断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生态。”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执行秘书长任林杰表示。

近期，新修订的《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正式施行，其中年满60周岁老年人患病住院期间，赡养人可享受每年累计不超过5个工作日陪护假、独生子女增至7个工作日的规定，引发广泛关注。这一看似细微的条款，或许能缓解一下职场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假期增量，更是城市治理理念从保障基本生存权向提升民生福祉、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善养”的深刻转型，其背后所蕴含的制度善意与人文温度，值得细细品味。

在老龄化进程加速与家庭结构小型化并行的今天，“一人住院，全家奔波”成为许多城市家庭的真实写照。尤其对于第一代独生子女而言，当父母年迈病倒，他们往往陷入“工作不能丢，父母不能不陪”的两难困境，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与精神焦虑。上海此次出台的陪护假规定，精准地回应了这一普遍性的社会痛点。

政策的温度，往往蕴藏于执行细节中。细览上海陪护假的规定，不难发现其设计充满了人性化的考量。假期可一次性使用，也可分次使用，契合了住院治疗周期的不确定性；明确事由和所需材料，为职工请假提供了清晰指引，同时允许紧急情况下“先口头、后补办”，体现了对突发情况的充分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规定明确适用于上海本市所有在职职工，且对老年人户籍和住院地点不作限制。这一“无差别”条款，打破了地域壁垒，彰显了上海作为超大城市的包容性与公平性，确保每个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的在职者，无论来自何方，其背后的家庭都能平等地享受到规定庇护，这本身就是城市吸引力的最佳体现。

从更宏阔的视角看，这项规定的出台，是上海在探索构建与超大城市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体系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社区嵌入式养老、适老化改造等举措，共同构成了多层次、全覆盖的养老支持网络。在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基本国情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破解“老有所养、病有所护”的难题，是各地面临的共同挑战。上海的实践表明，通过制度创新将家庭赡养责任与社会保障相结合，既能缓解家庭照护压力，又引导形成孝老爱亲的社会风尚，更能让职工在履行赡养义务的同时无后顾之忧，实现家庭责任与职场发展的平衡。

当然，任何一项新政策的落地，都面临着从“纸面”到“地面”的挑战。如何确保所有类型的企业，特别是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微企业能够理解并执行到位；如何防止个别用人单位设置隐形障碍，变相剥夺员工的合法权利；如何进一步完善独生子女身份认定等操作细节……这些都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和优化。我们期待，相关职能部门能够加强监督与指导，确保政策的善意不被打折扣。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上海陪护假规定的施行，是一次充满温情的制度探索，当一座城市愿意为市民的“床边尽孝”提供制度化便利，它所书写的，正是“人民城市”理念的温暖注脚。

在寒冷干燥的冬季，特别是北方地区，脱衣服时总能听到“噼里啪啦”的声响；见面握手时，刚一接触对方指尖会突然感到针刺般疼痛；早上起来梳头时，头发却“飘了起来”……这些都是静电在作祟。近段时间，我国大部地区雨雪稀少，天气干燥，多地静电活跃。静电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有说法称偏北风天气容易产生静电，这是真的吗？

气象监测显示，近一个月以来，我国较少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中东部多地降水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少，尤其是辽宁、河北、山东、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偏少超80%。

天干物燥易起静电。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周丽贤解释，由于在冬季，寒冷天气导致空气中水分含量减少，空气湿度迅速降低，当环境湿度小于30%的情况下，空气中的水汽难以传导电荷，原本容易消散的静电会大量停留在物体或人体表面，导致门把手、楼梯扶手、毛衣、头发等地方带电。

周丽贤表示，冬季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动频繁，由于缺少水汽的配合，冷空气活动以大风降温为主，天气干燥、雨雪不多。整体来看，北方大部地区以干燥天气格局

偏北风天气更易产生静电吗

静电指数越高，静电等省份均处于静电活跃区域。南方地区整体湿度较北方偏高，但仍比较干燥，不少地方湿度低于30%，导致静电风险相对较高。

大风天气尤其是偏北风，也是滋生静电的“温床”。由于偏北风往往来自内陆地区或高纬度地区，这些地区通常降水量较少，空气相对干燥。当偏风吹拂时，会把内陆的干燥空气向南延伸，从而导致受大风影响的地区变得更为干燥。

那么，干燥季节如何防“电”？周丽贤建议，一是做好环境增湿。冬天天气干燥，加上北方供暖，空气湿度降低易导致电荷难以传导，静电大量停留，在室内可开启加湿器，尽量让环境湿度保持在40%至60%之间。二是秋冬冬季内搭尽量选用棉质衣物。化纤材质的衣服本身摩擦易起静电，且电阻高导致静电难释放。三是做好皮肤保湿工作。尽量让角质层含水量保持在10%至20%之间，可有效传导电荷，促使静电消散。四是使用有效“放电”法。可用摸墙放电法，将静电电荷通过墙体导入地面。此外，还可使用金属小物件给可能带电的物品放电，降低触碰风险。

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新规顺应数字经济发展变化——

强化网络空间依法治理

□ 本报记者 李万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新规通过优化完善互联网法院管辖案件类型，凸显互联网法院司法便民利民、公正高效便捷解纷的功能作用，同时也释放了强化网络空间依法治理的鲜明信号。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嵌套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涉及数据、算法、平台、市场竞争秩序、个人信息保护等各类新业态网络法律纠纷不断涌现。设立互联网法院，是司法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2017年8月，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2018年9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相继成立，探索“网上纠纷网上审理”的新型审理机制。

2018年9月，最高法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的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网络购物、网络服务、网络金融借款、网络小额借款、网络著作权、网络域名、网络侵权、网购产品责任、网络公益诉讼等11类纠纷。

“当前，互联网法院在探索在线审理机制、构建完善在线诉讼规则的基础上，要进一步通过审理各类新型网络案件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加海表示，互联网法院核心功能已从“审理机制创新”向“治网裁判规则输出”迭代升级。

据了解，对一些新型、前沿、与数字经济关系密切的案件，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裁判标准不明确、法律适用不统一等情况。以数据权益类不正当竞争纠纷为例，不同法院对数据权益保护请求权基础、数据权益归属主体、数据行为合法性判断、相关经营主体竞争关系认定、数据行为与竞争损害之间因果关系，以及竞争损害大小判定等，存在着裁判思路 and 判断标准上的差异。通过由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相关新类型案件，能够集中优质审判资源，输出高质量裁判。

□ 按照最高法新规，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范围新增4类网络案件，分别是“网络数据权属、侵权、合同纠纷”“网络个人信息保护、隐私权纠纷”“网络虚拟财产权属、侵权、合同纠纷”“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 新规明确，“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小额借款合同纠纷”“在互联网上首次发表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权属纠纷”以及网络侵害名誉权、一般人格权、财产权等纠纷不再由互联网法院管辖。

按照最高法新规，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范围新增4类网络案件，分别是“网络数据权属、侵权、合同纠纷”“网络个人信息保护、隐私权纠纷”“网络虚拟财产权属、侵权、合同纠纷”“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同时，新规明确部分传统网络侵权纠纷不再由互联网法院管辖，而是由相关基层法院受理。这些传统网络侵权纠纷包括“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小额借款合同纠纷”“在互联网上首次发表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权属纠纷”以及网络侵害名誉权、一般人格权、财产权等。例如，北京地区的网络著作权案件将按照规定的管辖区域，分别由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等6家基层法院集中受理。

“现在，很多基层法院都具备审理传统网络案件的条件，互联网法院实际上就应该集中审理涉互联网的新型案件。”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表示，经过调整后，一般性、传统性网络案件在其他基层法院审理，新类型、前沿、复杂网络案件在互联网法院审理，这种分配方式更合理、归类更明确。

新规施行后，对当事人诉讼产生哪些影响？“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调整后，通过完善审理

机制、优化管辖格局，将更有助于提升当事人的诉讼体验和案件的审理质效。”周加海表示，北京、杭州、广州三地基层法院均有功能完善、运行稳定的在线诉讼平台，在适用在线审理机制方面有扎实的工作基础。对于调整至相关基层法院管辖的传统网络案件，当事人仍可充分享受“网上纠纷网上审”的诉讼便利。

3家互联网法院所在的北京市、杭州市、广州市，是我国数字经济创新高地和产业集聚区，汇聚大量头部科技企业，是各类新型、疑难、复杂网络纠纷“首发地”。“涉人工智能案件往往涉及对人工智能的生成过程、算法模型以及数据来源等进行司法审查，技术门槛高，事实查明难度大，对司法专业性要求高。”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赵长新说，北京互联网法院充分发挥专业审判优势，积极回应人工智能产业司法需求，以高质量裁判树规则、以高水平治理促发展、以高效能服务护创新。

周加海表示，此次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调整将为数字时代互联网审判工作注入新活力，推动司法审判主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变革，进一步提升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水平。